

主摇摇编 辕白摇烨

出版人 辋谢寿光
出版者 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摇摇头 辋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园号
邮政编码 辋园四零
网摇摇头 辋电话: 辋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
网站支持 辋(园园) 辋园园园园
责任部门 辋编辑中心 (园园) 辋园园园园
电子信箱 辋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园
项目经理 辋宋月华
责任编辑 辋宋摇娜
责任印制 辋园园园园

总 经 销 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园园) 远家猿怨另瑶远家猿怨猿
经摇摇销 轶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轶市场部 (园园) 远家猿怨猿
法律顾问 轶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摇摇版 轶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摇摇刷 轶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摇摇本 转德花伊里德毫米摇员最远开
印摇摇张 转苏豫豫
字摇摇数 转四四千字
版摇摇次 转四四元年 缘月 第 员版
印摇摇次 转四四元年 缘月 第 员次印刷

书摇摇号 转第 号 苑原 五 四 三 二 一 愿 原 员 肆 角 分
定摇摇价 转第 元 肆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摇翻印必究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中国文情报告（圆园园缘~圆园园远）轱白焯主编援原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圆园园缘

摇陈月岸苑原雪源起原立愿原员

摇Ⅰ鄧中援援摇Ⅱ鄧白援援摇Ⅲ鄧文学 原概况 原中国 原
圆园园缘~圆园园远摇Ⅳ鄧愿愿愿苑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远）第 圆园园愿愿愿号

“中国文情报告”课题组

摇摇摇摇主摇摇编摇摇白摇摇烨

编摇摇委摇摇贺绍俊摇摇阎晶明摇摇陈福民

李兆忠摇摇周摇摇瓚摇摇王剑冰

吴摇摇双摇摇陶庆梅摇摇张摇摇柠

秘摇摇书摇摇何摇摇鹏摇摇李摇摇旻

目摇录

悦的晕棘云棘杂

前摇言	轲员
摇彳创作走向	轲员
摇圃批评话题	轲原
摇獠事件举要	轲怨
摇灞几点看法	轲远
一摇长篇小说：现实人生的雄浑交响	轲员
摇彳乡土谣：是牧歌又是挽歌	轲圆
摇圃平民谱：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	轲原
摇獠成长颂：苦涩与快乐一齐诉说	轲愿
摇灞写动物：《狼图腾》之后有《藏獒》	轲员
二摇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	轲缘
摇彳批判现实的力度	轲远
摇圃底层生存的关注	轲圆
摇獠“新青楼”文学	轲圆
摇灞“海外军团”的崛起	轲缘



一摇 红色资源的挖掘	韩愿
二摇 为 苑园年代和 愿园年代证明及其他	韩园
三摇 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	韩毓
摇 郅大散文中的文化意蕴	韩毓
摇 郅散文中的心之声	韩苑
摇 毓隋短散文与新人新作	韩蕊
摇 灏亲情、乡土与纪实	韩园
四摇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	韩苑
摇 郅纪实类文学的市场表现	韩愿
摇 郅报告文学的空间选择	韩园
摇 毓“报告”与“文学”的命题	韩苑
摇 灏叩长扬短的呼吁	韩蕊
五摇 诗歌：“虚热”与“沉潜”	韩源
摇 郅“等待戈多”：谁是新诗集的出版人和读者？	韩源
摇 郅“超级”诗人：“郅缘诗歌热”为谁忙？	韩愿
摇 毓“在期待中”：寻访诗歌的小世界	韩源
摇 灏“白猫黑猫”：新诗批评摸着石头过河	韩园
六摇 戏剧：商品、艺术与“民间”	韩远
摇 郅商品的想像力	韩苑
摇 郅散落的艺术碎片	韩源
摇 毓民间的力量	韩蕊
摇 灏政策的保障	韩远

七摇网络文学：“规范化”中求发展	转页四
摇圆奇幻文学进入创作高潮期	转页五
摇圆“博客”写作的兴起	转页源
摇獠网络峰会与“阳光宣言”	转页苑
摇灞文学大赛与江湖联营	转页怨
摇结摇语	转页员
八摇批评实践与研究前沿	转页圆
摇圆“新世纪文学”的命名与研讨	转页猿
摇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考察与评估	转页愿
摇獠青春写作与“愿后”现象进入研究视野	转页源
摇灞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与自我反思	转页怨
九摇热点论争与焦点事件	转页缘
摇圆“精神沙化”问题争论	转页缘
摇圆名家遭遇“谗评”几例	转页园
摇獠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	转页缘
摇灞文化名人纷纷开设“博客”	转页园
十摇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	转页远
摇文学评论要关注现实	转页远
摇贾平凹：以《秦腔》为故乡树一块碑	转页怨
摇韩石山：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	转页圆
摇李美皆：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	转页员
摇王安忆：我是个小说女工	转页缘
摇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	转页愿



摇铁摇凝：写作着是美丽的	摇铁摇
摇余摇华：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	摇铁摇
摇李敬泽：给“愿后”浇盆凉水	摇铁摇
摇毕飞宇：《平原》让我踏实	摇铁摇
摇刘心武：关于“揭秘《红楼梦》”的答问	摇铁摇
摇王摇蒙：“揭秘《红楼梦》”要适可而止	摇铁摇
摇陆天明：好的作品要让读者灵魂“战栗”起来	摇铁摇
附录一摇铁摇年中国文坛大事记	摇铁摇
附录二	摇铁摇
摇新浪·读书频道摇铁摇年小说类图书排行（前 摇位）	摇铁摇
摇开卷摇铁摇年虚构类图书排行（前 摇位）	摇铁摇

前摇言

白摇烨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中国文情报告（~~圆四缘~~~~~圆四远~~）》，是我们“中国文情报告”课题组的第三本年度文情报告。因为报告中一些部分的内容涉及了~~圆四远~~年初，因而依然标注了“~~圆四缘~~~~~圆四远~~”。

这本主要以~~圆四缘~~年中国文坛各种现象与事件为描述对象的报告，分~~员~~章对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和文学批评、文坛事件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概说与评述。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圆四缘~~年的文学场域，在貌似平常中孕育着新的动向，在看似平实中跃动着新的步态。世纪之交时期的那种焦虑与浮躁似乎都不见了，但一些不同的倾向与力量都在积聚能量和悄然生长，这使得文学生态在其内部和深层，依然是新旧交替、激流涌动，事实上正在酝酿着一场以审美取向为表征的文学格局的新变动。

各个分类报告对于文坛的这种或明或暗的异动迹象和渐变情形，都有以点带面的具体评说，这里只就一些宏观层面的现象与问题，做一大致的勾勒和概要的阐述。

1. 创作走向

~~圆四缘~~年的文学创作在“叫好”与“叫座”两个方面，好像都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但由一些作家和作品不约而同显示出来的现



象来看,似乎有一些相近或相似的审美取向正浮出水面。比如小说创作中的“现实感”与“人民性”的凸显,在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的创作中,这样的—个审美取向,也有相当程度的显现和—定方式的呼应。较之以往,文学创作离人民的现实和现实的人民,越来越切近了。

长篇小说创作中,出自文学名家之手的新作联袂而至,数量显著增多,而这些名家新作较之他们过去的作品普遍增强了“现实感”。这种“现实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是在观照乡土现实中贯注了作者的历史反思;—是在选取和塑造作品人物时普遍以寻常平民为主角。前—种倾向,主要体现于阿来的透视—个藏区乡村在“现代性”下超常变异的《空山》、贾平凹的对乡土社会在变革中有得更有失的惘然哀叹的《秦腔》、毕飞宇的观照乡村生活政治化过程的《平原》、刘醒龙的勾勒—个乡镇百年政治争斗史的《圣天门口》;而后—种倾向,则主要表现为余华的《兄弟》(上部)、东西的《后悔录》、王安忆的《遍地枭雄》等作品。而无论是《兄弟》中的宋凡平和李兰的命运乖蹇和家庭破碎,还是《后悔录》中曾广贤的爱欲情感从未得到实现,抑或是《遍地枭雄》中韩燕来阴差阳错地卷入汽车倒卖案件,都把“小人物”在社会中的生活无奈和命运无常,写得既不露声色,又惊心动魄。这样的作品既让人觉得亲近,又让人觉着陌生,因为作者在切近现实的同时,又都有着带有自己个性的生活发现与艺术表现。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现实感”与“人民性”主要表现为作家认知现实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批关注底层生存又含带着社会批判意味的作品不断涌现。如韩少功的《报告政府》,葛水平的《浮生》、《黑口》,胡学文的《路上行走的鱼》,杨少衡的《林老板的枪》,叶广芩的《对你大爷有意见》,刘庆邦的《卧底》等等。这些作品以平等的姿态看取底层,又以知识分子的良知暗含臧否,读来每每让人深

有所感，又若有所思。其中杨少衡的创作特别值得注意，他笔下的县长形象，以不墨守成规和因时因地制宜的方式，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坚持着人民的根本利益。杨少衡实际上写出了新形势下的新型基层干部形象，同时也以这样一些形象诠释着他对“人民性”的独到理解。

在散文创作中，“现实感”同样在增强，而这一方面表现为大文化散文更关注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社会现象，如胡平的《战后日本社会考》、张贤亮的《美丽》、王充闾的《他这一辈子》、刘长春的《八大山人》、田中禾的《关于心理健康》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带有纪实性特点的作品的陡然增多，如张平的《老百姓让你心惊肉跳》、朱金平的《今生无悔》、裘山山的《四十年前的爱情》、从维熙的《国学风流》等。这些作品或记个人所见所感，或述他人所经所历，均以来自生活的真情实感和生活本身含带的诸多意蕴引人和感人。

包括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在内的纪实文学，因为与生活的关系更为直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有相应的作品加以反映和表现。圆四缘年间的报告文学，作者看取生活的视野不仅下沉了，而且见新了。像航天壮举、移民热潮、打工一族、艾滋现象、禁赌风暴等等，都由一些作品做了及时的书写与近距离的扫描，使人们经由纪实文学作品，即对社会生活中的潮动与问题就有了同步的了解与概要的认知。传记文学方面，《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灵隐元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等作品，因为在纯粹的纪实性上表现出相当的“说真话”的勇气，成为纪实写作中值得关注的重要作品。这一年在报告文学领域发生的“报告”与“文学”的讨论，也是老话题的新延续，因为在创作中重“报告”而轻“文学”的倾向越来越盛，这一问题的讨论显然是切中时弊的。

因为诗歌、戏剧领域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它们在圆四缘年所面临的，主要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如何更好地“生存”和有效的“发展”的问题。近年来，诗歌始终面临一个读者少



和出版难的困窘境地，但网络传媒的勃兴与发展，又似乎为它打开了另一块天地。一些诗歌网刊和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与纸质诗刊和诗集的不景气形成鲜明对比，诗歌走向了纸上趋“冷”而网上趋“热”的新的格局。而戏剧较之于往年，似乎有了不少振兴的迹象，这既表现于创作与演出的较为活跃，更表现于市场化运作的增强和民间力量的介入，这使得戏剧舞台有了可变的花样和可看的剧目。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那就是形式上的探索被更关注之后，戏剧应有的“艺术气质”相对淡化，戏剧变得不那么轻易能看得懂了。这一问题引起注意是必然的，因为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是包括戏剧在内的一切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

2. 批评话题

作为整体文学事业一翼的文学批评，应在追踪创作的同时超越创作，一方面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及时而认真的论评，一方面又对文学发展中的倾向性问题和整体性走势做出理论的评估和发出自己的声音。2005年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正由长篇小说的现状考察与新世纪文学的理论研讨，表现出既着眼于具体又放眼于宏观的双向努力，并在一些问题的思考与研讨上，或以共识性的看法取得一定的进展，或以有价值问题的提出打下了继续深化研讨的良好基础。

在长篇小说的名家新作的评价上，2005年较有影响的是有关贾平凹的《秦腔》和余华的《兄弟》的评论与争议。贾平凹的《秦腔》出版之后，首先在上海召开了研讨会，与会的评论家认为，《秦腔》在两个方面应该被充分肯定：一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转型期农村巨变过程中的某种时代情绪，是对正在消逝的千年乡村的一曲挽歌；二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秦腔》用瓷实精到的描写重塑了一个鲜活真实的世界。这种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日常人事入手的描写，犹如细流

漫延，最后汇流成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某种角度而言，也是对近年来许多临空高蹈、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的一种“拨乱反正”。在北京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同样给了《秦腔》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贾平凹以一种近乎乡村日志的方式为故乡立碑，这种碑已经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或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鞭挞批评，而成为一种乡村流年碎影的忠实记录。许多评论家在发言时，都从不同角度谈到了《秦腔》的阅读艰难。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叙事琐碎沉重，充满日常化细节，节奏缓慢，内容沉重，尤其取消了长篇小说惯常的叙事元素，如连续性的情节。但大家也表示，这种文体创作的背后，有极其重大的重要性，如它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瓦解掉了乡土中国想像性的东西，等等。余华的《兄弟》，是一部长篇小说的上半部。余华自己认为“对这部作品我自己是很满意的，我个人认为我写下了以前没有写过的东西”。书刚面世，作家陈村就在发表于《文汇报》的评论文章中说，“余华是个有职业道德的小说家，从不令人失望。”评论家洪治纲认为：“它（《兄弟》）将历史、暴力、罪恶与人性中最为本质的爱紧密地浇筑在一起，使我们在一种历史的‘暴力奇观’中，深深地感受到这种爱的伟大、宽广与无畏，也看到了生命中某些恒久的、无可匹敌的伦理之光。”评论家李敬泽对《兄弟》持一种批评性的看法，他在《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的评论里指出，“余华在写《兄弟》时不在人物的里面，他站在外面，他已经感受不到《呼喊与细雨》那样来自生命深处的尖锐疼痛，他的目标说到底也就是讲一个有趣的、热闹的，看上去‘深刻’的故事，他当然成功了，但为了这种成功，他必须煽情，必须向读者进行情感勒索，让他的小说充满骇人听闻的暴力、死亡、天长地久的爱情和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噱头。”

在长篇小说创作的“新变”成因与走势的阐释与解读方面，市场化的运作的利弊得失成为了一个相对集中的话题。在茅盾故乡浙江桐



乡举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活动期间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上，与会者就长篇激增的背后原因及其长篇创作与运作中的商业因素展开激烈研讨。一种意见认为：“商品意识对我们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有些作家完全是为商业写作，在构思阶段就很媚俗，就考虑怎么能招徕读者。”持这样看法的同志认为，受市场因素的影响，作家们的批判意识比以前薄弱了。“现在技术型写作、智慧型写作、游戏型写作的多了，而具有清醒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创作少了。”但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作家能不能摆脱市场化的影响不是一个道义问题，而是文学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大势，市场对文学的影响不全是负面的：“文学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比较充分的时代，也恰是文学繁荣的时代。沈从文就曾说过，三十年代他之所以进入创作的丰产期就和书商的‘催逼’有很大关系。”持这种看法的人还反问道：“如果没有市场化，长篇小说能这么繁荣吗？市场是把双刃剑。关键看如何趋利避害。”他们还认为，当前评论界对长篇小说的问题批评得太多，而对成就分析得不够，“对此，我们要说‘不’。其实，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具体作品上看，当代长篇小说的成就不但超越了‘文化大革命’前 15 年，而且也超越了现代时期。从艺术上看，当代长篇小说要比那时成熟得多。”

文学批评中有关“文学新世纪”的话题，从 1994 年起，就不断闪现在一些批评家的文章里。但在文学史的意义上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让它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还是在 1995 年间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沈阳师大文化文学研究所和《文艺争鸣》杂志联合召开的“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以及随即在《文艺争鸣》杂志开展的“关于新世纪文学”的专题讨论。这样一会一刊的相继研讨和遥相呼应，使得“新世纪文学”的话题为学界更多的人所参与，其在文坛内外的影响也渐渐扩展开来。

在“新世纪文学五年与文学新世纪”学术研讨会上，会议组织者

谈到这一话题的缘起时说，新世纪这五年的文学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当代的历史。“新”，是前进的动力。新世纪的文化景观和文学景观促使我们要以一种平常心来直面这个“新世纪”。“新世纪新表现”，并非是一个已然定性的概括，也并不是盲目地去崇拜“新”，而是需要我们面对新世纪五年文学发展的客观实际，在与之构成的对话关系中展开理性思索。倾向于首肯“新世纪文学”的一些同志还具体论析了新世纪文坛值得关注的走向以及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所在。其一，人们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越来越切实。与 1980 年代中后期相比，当下的文坛已由平和取代了焦躁，沉稳取代了喧嚣。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文学领域自身的不断调整，人们对社会现实和与之相联结的文化、文学现实的认识日趋理性化，也越来越切实。反映在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就是文学创作中更见个性化，理论批评中更具宽容性。其二，“市场化”的“双刃剑”性愈来愈显见。“市场化”作为文学、文化生产的主要方式，带给文学创造的正、负面影响日趋凸显。其三，新老媒体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市场”的渗透，“网络”的崛起，使文学、文化领域不再像过去那样，作品只刊发于纸质媒介，评论只出自于评论家笔下。新世纪文坛有了更大的活动平台，它在诗意中坚守，在坚守中生存，在生存中发展。还有人从精英文化的立场，描述了新世纪以来文学叙述的变化。第一，思想性降低，大部分作品缺乏思想上的追求。即使一些名家作品，也有令读者失望之感。第二，文学叙述不够讲究，显得匆忙、草率，调侃过多；文学阅读多追求快感。第三，以文学形式出现的非文学叙述日趋发展。其中公众叙事成为一种时代命题。公众叙事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对公众心态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作家的文学叙事。从政界到商界、教育界的各方人士，都在参与着写作。这是社会自由度增加的表现，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表现。

也有人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指出，“新世纪文学五年”是一个文学



史的问题,“文学新世纪”属于文学批评问题。20世纪年代末、21世纪初这一段文学时期很有自身的特点,“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度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新时期文学体现了对自身、对历史、对开辟文学新纪元的自信,可以说是一种“承诺的文学”。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无论是文坛格局、写作策略、阅读方式、作家姿态还是对作家的要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空间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以往文学史的论域。新世纪文学形成尚未清晰的文学史线索,缺乏明确的动力,找不到逻辑递进关系,这也造成了我们对其进行文学史价值判断的艰难。也就是说,很难单纯地进行简单定位,建立其合法性。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有批判立场,因为完全中立是不可能的。新世纪文学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景观,而不仅仅是欢欣鼓舞。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提法,也有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人提出,当我们用“新世纪”来指认或命名文学时,应该对“新世纪”这一历史时间概念进行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不应简单地将“新世纪”理解为一个客观物理时间概念。“新世纪”命名作为一种时间的政治或时间的现代性,隐含着强烈的线性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念,它型塑着盲目乐观拥抱未来的现代性进步幻象。这种时间命名本身已表明我们依然凝滞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幻象之中,它容易使我们遮蔽或遗忘掉20世纪文学中的现代性危机意识。20世纪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现代性反思批判、颠覆解构的文化策略,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悬而未决。因此,新世纪文学并不意味着盲目乐观的未来憧憬,而应接续20世纪文学所突显的现代性危机意识,以批判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和策略,继续颠覆解构现代性所建构的种种文化幻象。21世纪,现代性作为终结之物依然坚如磐石;新世纪,后现代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有的质疑者还认为,虽然新世纪在时间上来说的确已经开始并不断融入历史,但文学却并没有同步进入“新世纪”。“文学新世纪”只是人们构建世纪初文学发展脉象的良好心愿与美好设想,而不是文

学发展本身的客观呈现。与 20 世纪 80 年代相比，当今的文学发生了巨大变化是毋庸置疑的，而且这种变化是显在而鲜明的，但与 90 年代相比特别是 90 年代后期相比，世纪之初的文学并没有质的突进。主要表现在：（员）总体的文学发展环境自 90 年代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圆）就作家而言，拜金主义写作、机会主义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风气未见削弱，作家从社会的病相与时代的病相面前常常侧身而过。（猿）就文学批评而言，存在关系批评、圈子批评、金钱批评甚至蓄意炒作现象，坦诚的理性的批评声音略显微弱，求真务实的批评需要加强。

3. 事件举要

由热点论争和焦点现象总体构成的文坛事件，在其背后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动因。就一些论争来说，它既是不同的文学观点与观念的碰撞，又关涉到如何看待当下的文学文化现状；就一些现象而言，它既可能是个体行为被“炒作”和“放大”的结果，也可能是新的文学诉求借助新的媒介张扬自己的具体表现。

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有影响的事件与现象，择其要而言之，主要有“精神沙化”问题争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引发争议等。而这些热点论争与焦点现象，也越来越充分地显现了看似简单背后的复杂，以及事出偶然背后的必然。

“精神沙化”问题的争论，源于作家张炜的一篇文章。20 世纪 90 年代 1 月，张炜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思想随笔《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在这篇文章中，张炜反复强调了这样一个中心意思：“在所谓的‘商品经济大潮’中，我们这儿还没有产生它的精神上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思想和创见偶然显现，就会像一滴水洒到沙漠上一样，迅速地被吸光了、消失了，无声无息。什么都



不可能存在，因为已经沙漠化了。”“五六十年代的‘平均化’、‘板结化’固然不好，但在今天作为一种反动，那种板结完全被搅碎了。它是被一根商品经济的棍子给搅碎的。这个棍子粗壮而强悍，它插进去稍稍一动就搅碎了。但它不是搅出更自由、更疏松的一片文化土壤，不是很利于生长的那种土壤，而是愈搅愈烈，最终搅成了一颗一颗的砂粒，搅成了一片文化和精神的沙漠。”这篇随笔性的论文，显然既体现了张炜对当下文化状况的自我评判，又表达了他对知识分子状况的愤然批判。张炜的文章发表之后，《上海文学》第 9 期以《关于“精神的背景”的反响》为题，发表了《严峰的意见》、《毛尖的意见》，以及主编陈思和书信式的点评。陈思和就此指出：“一如 1990 年前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张炜所发出的‘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的呼喊，面对消费时代的写作及当下的精神背景，张炜再一次发出呼吁：在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坚持自己的精神立场，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超越当下的精神困境？”

张炜的文章尤其是《上海文学》对其的肯定性评价和褒扬性举动，最先引起了上海批评家吴亮的强烈反感，他写了一篇《顺手记》，发表在陈村主持的“小众菜园”的网络论坛。之后，看到《上海文学》第 9 期的相关文章，吴亮又写出《世界是有些混乱，但批判不可以混乱》的文章，既向张炜提出挑战 and 质疑，也批评《上海文学》“找了几个人为这篇文章唱赞歌”。他指出张炜的《精神的背景》，没有理清自己的基本思路和概念，没有掌握并使用必要的（更不要说充分的了）证据，没有了解（更不要说熟悉了）同代人关于同类问题或相关问题的大量研究著述。他诘问道：“你若想正当的断言你所谓‘精神沙化’的真实性，你必须能指出你准备接受什么可能的证据来表明你理论的虚假性。”“描述一个时代的时候，频繁使用‘整个精神背景’、‘整个精神文化’、‘整个文学界’、‘整个世界’，或‘真正的思想和创见’，‘真正的思想者’，‘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真正